

## 人文大師下午茶·吳玉山院士 「我們的政治學：傳統與挑戰」<sup>#</sup>

- 時間：107年9月25日(二)14:00-16:30  
地點：國立臺灣大學校史館中央展廳  
主講人：吳玉山(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、中央研究院院士)  
主持人：吳重禮(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)  
與談人：王宏仁(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)  
王奕婷(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左宜恩(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平思寧(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張其賢(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)  
郭祐韜(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郭銘峰(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黃凱華(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蔡韻竹(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)  
魏楚陽(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)  
記錄：胡雲薇(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)



圖一：吳玉山院士(前排左三)、吳重禮教授(後排左四)、  
曾嬾芬主任(前排左四)與年輕學人合影

<sup>#</sup> 本文由胡雲薇博士記錄整理，經主講人吳玉山院士審訂。

在秋意漸濃的午後，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由政治學領域專家吳玉山院士，帶領聽眾一起思考「我們的政治學：傳統與挑戰」。正如鑑古可知今，想瞭解當前的政治學研究，必定得先清楚過去為何出現、如何發展、曾面臨什麼問題，如今又要面對什麼挑戰？

## 一、那些年的人與事

中華民國的政治學發展，一開始便受到國際學術潮流與國內政治局勢的雙重影響。當時西方政治學主要強調探索規範與制度之學，公法色彩相當濃厚，引進國內後也深受其影響，研究領域偏重政治理論、憲法、國際法的討論。由於民國初年政治局勢不甚穩定，連帶影響到政治學發展，然即便如此，初扎根的政治學依然取得顯著的成果。例如，當時全國百餘所大學就有 48 所開設政治學系；1932 年在南京中央大學成立了中國政治學會。又如，1948 年選出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便有四位政治學學者，分別是專長憲法研究的錢端升、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浦薛鳳、憲法與國際法領域的王世杰，以及擅長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蕭公權。這份院士名單充分反映當時以規範和制度為主的學術傳統。只是，隨著 1949 年兩岸政治隔絕與對立，這項政治學傳統面臨分裂，在臺灣得以保留延續；在中國大陸則被迫硬生生斬斷。

## 二、民主化之前的政治學

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西方政治學進行了「行為革命」，從過去重視理念與規範，結合哲學、法學和史學的研究方法，逐漸轉向連結社會學、心理學、經濟學，亦即從「脫人文化」走向「社會科學」。這股學術風潮也波及至臺灣，從人文逐步走向社會科學，是這段時期政治學發展的最大特色。只是，好的政治學研究除需與國際學術潮流俱進外，也需要寬鬆的政治氛圍，但在戒嚴期間由於政治環境緊縮，並不利於學術的正常發展。當時非關本國政治的研究，如國際關係、公共行政、政治哲學理論、各國政府與政治等領域較無禁忌；攸關本國政治的部分，對中國大陸的研究一開始偏情報之學，採取嚴格控管，後來則逐漸放寬，並走向國際交流，以進行學術外交；對臺灣內部的研究，則始終屬於紅線禁區。不過，當時也有一些積極引進新學術、遊走在禁區紅線上的代表性人物，如剛過逝的中研院院士胡佛，提倡以行為科學從事政治學的經驗研究，並實際透過他所擔任的學術職位發揮影響力，終生宣揚民主自由的理念。

### 三、迎向民主化的新境界

臺灣政治學在民主化之後起了巨大變化，解除過去對本國政治討論的限制，往昔禁區得以逐一突破，讓原本最為落後的次領域上升變成顯學。在研究方法上，新穎的計量方法開始受到學界矚目，各單位陸續建置大型資料庫，學術研究出現飛躍性成長。另一個學術亮點，則是和國際學術界緊密連結，臺灣政治學邁向國際化與比較化研究，例如臺灣大學設置了東亞民主研究中心（Asian Barometer），或如政治大學所主導進行的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（TEDS），講求使用數量的方法論。

與此同時，臺灣政治學內部也正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學科整建工程。數量化的學術評鑑法興起，論文引用次數成為評分關鍵，能發表在國際期刊者被重視，學術期刊也被列入評比對象，非I's者不被看重。換言之，量化表現決定了研究資源的分配，諸如計畫補助、續聘升等、學術獎勵等等。這個由國家驅動的單一評鑑標準，從國科會／科技部到各大學科系、直至所有教研人員，無一能脫離其框架與影響。在這種高度競爭的學術氛圍下，政治學的學科層級架構確立成形，所有人員的獎懲也都被納入此一規範體系。

### 四、我們的政治學

在這個議題本土化、方法數量化、評鑑格式化的高速進程裡，政治學作為常態科學確實取得空前的進展，卻也似乎有所失漏。當政治學逐漸成為一個「標準化」學科之時，學者們似乎應該重新思考幾件事。第一、在討論議題上，民主化是否適合作為研究的切分點？民主化之前與之後的政治，難道沒有關聯？不研究民主化之前的歷史，究竟是礙於資料局限、或是個人對威權政治的排斥？事實上，刻意的時間斷限容易造成制度與文化、人物與事件之間的隔閡，無法進一步探究跨時間的聯繫與互動，也易於發生對現象理解的淺窄化。其次，這種研究區分無形中也置大量可供經驗分析的研究資料於不顧，捨棄政治學在歷史與文化方面的可能探索。再者，由於缺乏政治學所提供的科學研究與因果探詢，社會對過去政治現象的理解容易受到政治行為者的主觀詮釋。更致命之處，在於失去架構與發展威權體制政治學的良機，無法藉由臺灣過往經驗的探索，對比當前中國大陸的現狀，也難以深化臺灣的中國研究。而這個領域，是對臺灣極端重要，並在國際學術界中具有優勢的區域研究領域。

第二件事是關於政治學的研究方法。過去量化方法的精進，極大程度強化了政治行為學的討論能力，也跟上了美國學界所引領的社會科學風潮。但是，當政治學從人文學轉向核心科學後，除政治思想領域尚討論規範問題之外，其他範疇多將西方流行的價值體系視為理所當然，不證自明。有關價值的探討和追求，不是在經驗研究中銷聲匿跡，便是隱晦地作為前提出現，而其本身卻未經論證，缺乏深刻的根底。其次，在單一化方法論的框束下，學者不自覺遠離無法帶入特定研究法的議題，無論此題目是否重要，學術研究與現實需求逐漸脫節。量化的研究方法也讓政治學距離思想和價值的研究更遠，無法適時解答社會大眾對政治學者的提問與期待。次之，與歷史隔絕的態度，也讓政治學無法與史學相互發明，處理與時代變遷密切關聯的議題；而與思想、哲學、法律脫鉤的政治學，更無法從這些傳統汲取養分，相輔相成。目前正值全球自由主義遭受嚴峻考驗之際，臺灣政治學界卻出現回應無力的狀態，此時實有必要重拾強調人文精神的傳統。

第三件事則是應重新思考政治學該如何來進行評鑑。臺灣從 1990 年代開始大學數目驟增三倍，高教研究資源競爭激烈，加速評鑑研究表現的重要性。由於臺灣缺乏西方社會的民間資源，官方所設定的標準乃成為各院校學術審查幾乎唯一的依據，如 SCI、SSCI、TSSCI 和 impact factor 等遂成為左右研究者聘任、升遷、研究經費、獎勵與學術地位的標竿。指標數據化的評鑑，雖有其形式公平、機制透明，降低個人關係的影響力與獎勤懲惰等優點，然亦出現許多值得憂慮之處，包括大家重視研究甚於教學、期刊重於專書、英文書寫重於中



圖二：會場一隅

文、獨厚 I's 等種種副作用。由於研究影響力指數已成為唯一的權衡標準，不僅質性評鑑受到忽視，窄淺量化且重視時效的評鑑指標，也帶來許多負面後果。例如研究者往往只求短期、快速的研究積分，無法推行深遠具影響力的拓展式研究。鑑於上述單一量化評鑑的缺點，當前學界逐漸採用多元的觀察視點，像是將教學納入獎評機制、理解專書的重要性，期刊評比也納入實質審查，在在凸顯質量並重評鑑的重要性。誠如中研院院長廖俊智所言：「要重視 impact，而非 impact factor；有好的 impact，impact factor 必然隨之而來。」

總之，若政治學能夠重視跨時議題、重拾人文傳統，並實行多元評鑑的話，將會更有助於學科發展以及與社會的對話。

## 五、提問與回應摘要

提問：對於有志於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生，有哪些能力應該及早培養呢？

對於想以政治科學研究作為終生志業的學生，除應瞭解當前的學界生態與研究壓力外，也需判別學術研究不同於外界所見的表面政治現象，自有其該恪守的學術規範與嚴謹性。此外，學問要做得好，有兩樣能力非常重要。一是不忘初心，保持對學問的好奇心與強烈的使命感，以及對人文關懷的精神。二是要經歷科學訓練的嚴格試煉，要能熬受一關關的學術考驗。

提問：政治大學政治系主任盛杏湓主任曾提問，為何西方國家政黨體系結構多以階級為主，而臺灣社會卻以族群來區分？臺灣為何沒有形成以階級導向的政黨體系結構？

1989 年當臺灣開始民主化時，農運、工運的社會衝突如火如荼展開，那時確實有可能走向階級的政黨體系，但同時黨外、海外臺獨的力量，即國家認同、族群意識也熱絡活動著。二股勢力在競逐優勢的過程中，較量可動員的社會力量，最終決定了臺灣的政黨體系主要是沿著認同分歧而發展。不過，這個相對性的社會力量並非固著不變，而是可能隨著時間更迭再起波瀾。因此，學者應找到幾個特定的社會分歧點，尋找造成影響的可能因素，再去比較、分析其相對強度。例如，過去臺灣經濟快速成長，但之後又明顯下跌，社會分配漸顯不公平時，政黨組成與自我認同也出現新的變化。如何去發現、動員這些力量，便是政治企業家可能介入的時機，而政黨體系結構也可能因而發生轉變。

**提問：臺灣的政治科學家是否必須從事與臺灣相關的議題研究，抑或可純粹只是個政治學家？又，政治學的基礎研究如何應用到現實環境？**

關於這個問題，也許更好的解決方式是，能不能做與臺灣有關，但又不止於臺灣的研究。也就是說，將臺灣個案作得深入、細緻之後，要拉到比較的研究範疇，一方面將臺灣的問題看得更清楚，另一方面也可透過臺灣例子貢獻於比較理論。關於是否能當個純粹的政治學家，端看研究者的視角與想法，即便是柏拉圖也能納入對於現實政治的討論，例如現代社會是否要提煉出一個哲學家皇帝，以能人主政，依然是可以討論的議題。至於選擇基礎或應用之學，學者可依個人興趣與研究優勢自行決定，只是基礎性研究若沒做好，也很難應用於現實環境，這也是中研院等基礎研究機構存在的重要價值。

**提問：面對不同世代的學生及其面臨的問題，您如何調整自己的教學目標與內容，以符合不同世代的學生需求？**

面對不同世代的學生類型與需求，教師應試圖瞭解他們的所思所想、所需所要，以常保年輕的精神，實際體會、理解學生的各種改變。教學內容則要與學生所處的政治環境相關，使其所學可與外面對話、產生連結。不論是古代希臘哲人的思想、西方學術理論或個人的觀察，都應該讓學生有著結合切身相關，可以回應現實需求的滿足感。簡單歸結到兩個重點：首先，老師應跟上時代變化，瞭解各世代青年之所需；其次，老師亦需自我更新、精進，把握學術前沿的動向。

**提問：政治學者的社會角色應該為何？作為學術工作者，應如何與現實政治保持恰當的距離？又該如何回應社會民眾的提問？**

政治學學者經常被問及實際的政治與社會問題，或被質疑本身的學術是否能夠產生實質的影響。此時政治學者若能相信自己的專業研究與學術價值，對於社會一般人的提問就能理直氣壯、侃侃回應。雖然學者並非政治人物，仍可運用研究所長，深入分析各種政治現象，解答社會的疑惑。身為政治學學者，不要太受民眾一般既定印象的影響，應堅守自己的學術專業性，不疾不徐地回應社會可能的諸多疑問。所有這些的基礎，當然就是自己在專業上的能力與自信。